

这方热土英雄辈出

■孙现富

红色足迹

我出生在山东梁山。每次提起家乡，我都会自豪地说：“《水浒传》读过吧，讲的就是俺老家。”其实在我的心里，当年的八百里水泊不仅有演绎中的大义传奇，更有硝烟弥漫的红色记忆。

抗日战争时期，梁山一带曾是八路军115师活动的重要区域之一，杨勇将军指挥的“梁山战斗”就发生在这里。这也是我们小时候最爱听的战斗故事。

1938年8月2日，日军一个精锐大队进犯梁山，八路军侦知敌人企图后，布下“口袋阵”决定歼灭该敌。“战斗打得很激烈，很残酷！”据抗战老兵谭德本当年回忆，经过几轮激战，我军把日军诱到梁山脚下的独山村。独山村周围是水，没有其他隐蔽物，八路军趁夜色抢占了村里的制高点，日军发现后企图夺回。

“看似我们占了优势，但武器太差了，敌人光炮就有3门，他们在炮火的掩护下发起6次冲锋，都被我们打退了。当敌人第7次攻击时，我们阵地上只剩下不到30人了，但没有一个人退缩，没有子弹的伤员就搬石头砸，都拼急了！”谭德本说。危急关头，686团11连急行军赶到。日军在两面夹击下，除24人被俘外，其余300多名日军全被歼灭。这次歼灭战，被八路军总部表彰为“模范歼灭战”。

读中学的时候，我加入了梁山小作家协会，经常和同学们四处挖掘梁山的

红色历史。我们在追寻中接受着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教育。在一次采风时，我们知道了“梁山战斗”的另外一个细节：被击毙的日军指挥官长田敏江，虽然只是个少佐，但由于出身皇家贵族，他的死给了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

岁月悠悠，斗转星移，硝烟早已散尽，如今“梁山战斗”的主战场独山村，已成为红色旅游景点。战斗旧址公园旁边建起的梁山抗日纪念馆，每天吸引着大批游客前来参观。瞻仰抗日英雄纪念碑、聆听战斗故事，人们在享受和平盛世的同时更加感受到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今年夏天，我再次来到独山村。漫步街头，别有一番感慨。

悠长的石街小巷，蝉鸣声声，地上错落有致的大青石板写满岁月沧桑。厚重的老屋砖墙上，仍能清晰看到累累弹痕。闭目静思，仿佛可以听到它们在讲述着梁山儿女以铮铮铁骨战强敌的英雄壮举。在街中心的一处老宅，我碰到几个系着红领巾的小学生，围着一位老者在聆听着什么。过去一问得知，他们是采风的学生，老人是抗战老兵谭德本的后人，在讲述“梁山战斗”的故事。孩子们不时在笔记本上记录着，一脸凝重。虽然我和这群孩子没有太多交流，但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红色基因的传承，更感受到伟大的抗战精神蕴含的力量。

当年，我也是在这种力量的鼓舞下选择了参军。那一年我17岁。一晃30多年过去了，当年意气风发的少年郎，如今已是中年，但内心的炽热和朝气依然澎湃激荡，还像年少时一样，对家乡的红色历史满怀敬仰。所以，每

次回家探亲时，我都要去那些红色旧址拜谒寻访。

其中，就有位于蔡楼渡口的“将军渡”。这个渡口形成于清代末期，是连接山东和河南的重要水陆交通枢纽。1947年6月，刘伯承、邓小平就是在这里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渡黄河，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因此，这里被后人赞颂为“将军渡”。

惊涛骇浪，波涛汹涌，奔腾不息的黄河水见证着中国革命的艰苦卓绝，也诉说着梁山儿女不畏艰险、敢于斗争的英雄故事。站在“将军渡”，我不由得想起一个人：“人民功臣”全士文。他家住在渡口附近的程坊村，从小在黄河岸边长大，熟悉水性，胆大心细。刘邓大军渡河南下后，他作为黄河指挥部水兵一连连长仍然战斗在“将军渡”。

有一次，他们送6辆满载物资的汽车过河，其中一辆由兄弟连队负责摆渡。没想到，船至河心，骤起风浪，汽车沉没河底。全士文不顾水流湍急，毅然跳下水，凭借多年的作业经验和水性，很快摸到汽车，并组织战士用油丝绳、大木架把汽车拉上岸。后来，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在菏泽召开庆功大会，部队首长将一枚金光闪闪的“人民功臣”特级奖章挂在了全士文胸前。

英雄已不再，但他和战友们的英勇事迹仍在当地流传。为了纪念那段红色历史，渡口两岸建起“刘邓大军纪念馆”“指战员将士群雕”“渡河处碑亭”等。蒙蒙细雨中，我伫立在纪念碑前，禁不住热泪盈眶，眼前浮现的都是烽火连天的战斗场景。战士们冒着枪林弹雨，突破敌人防线，穿越黄泛区，

挺进大别山，就像一把利剑直插敌腹地。据史料记载，梁山在革命战争中牺牲的烈士就有800多名，其中396人没有留下名字。

如今，“将军渡”早已架起京九铁路大桥，公路浮桥也畅通无阻，成为连接山东与河南、河北、山西的水陆交通要道，见证着历史的沧桑与变迁。当年用小木船、小推车把刘邓大军送过黄河，曾常年饱受黄河泛滥之苦的老区人民很多住进了“小洋楼”。在黄河滩区翠屏家园的刘大爷家，120平方米的新房宽敞明亮，天然气、热水器一应俱全。“学校、卫生室、商业街、社区都有，空气还比城里好。”刘大娘笑着说。看着他们一脸幸福，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激动。党的宗旨是为人民谋幸福，他们脸上的笑容不正是我们共产党人所追求的吗？

这几年，我每次回去最大的感受就是家乡变化太快。如果不用导航，都有可能找不到回家的路。“四纵七横”的路网让东部新城成为一颗璀璨明珠；聚义湖、梁山泊水库，还有全长29公里的生态健康环城水系，让昔日的梁山泊重现风韵。今年刚通航的联运码头——梁山港，将成为领航运河、通江达海、辐射全国的交通枢纽。它不仅开启了济宁内河水运、多式联运、智慧港航的新征程，还让具有梁山标志的特种车辆从这里启航，奔向俄罗斯、蒙古国等国家。

华灯初上，我登上梁山，站在虎头峰远眺北方，满目璀璨。看着欣欣向荣、充满发展之光的梁山，我内心涌动着感动和自豪，这不正是革命先烈们为之奋斗的夙愿吗！

人物命运的时代投影

——长篇小说《五湖四海》创作谈

■石钟山

在某个阵地上，我牺牲了，周遭是真刀真枪的拼杀，枪炮声富有质感而又立体。牺牲的细节详实逼真……这是我年轻时，多次出现在梦境中的场景。的确，我并没有牺牲，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入伍，后在空军某部服役。别上说上战场，就是当年去边疆也没轮到过我。

我是在和平时期成长起来的军人，对于战争的印象，多是源于小时候读过的书或者看过的电影。是的，参军时，我曾做过英雄梦。也许不仅是我，我们那个年代出生的许多男孩都有过这样的憧憬。

许多年过去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经历了太多的转变。改革开放、百万大裁军等大事都发生在那个年代，几乎每天都充满了变化。人物命运，几乎每年都会有转折，戏剧性而又富有张力。记得我当排长时，排里有名战士，是超期服役的老兵，他最大的梦想就是留队。他生于四川的大巴山中，我们都说他的故乡很穷，他想通过留队而改变自己的命运。在确定他复员那天，他请假外出买回来一只烧鸡，一瓶酒，还有一包香烟，这在他以前是从未有过的奢侈。回来后，他把自己关在宿舍里，吃鸡喝酒，样子不是享受而是痛苦。连队怕他出意外，让我带一名战士暗中关注着他。他终于喝醉了，把空酒瓶摔在地上，抱住我嚎啕大哭。后来，这个老兵还是在第二天离开了部队，离开时他的样子很平静。

上世纪八十年代，乡村与城市的差距是巨大的，有太多的士兵想通过参军这条路改变自己的命运。命运参差，自然有喜有悲。我自从写作之初，就想写写身边的战友及自己这代人所经历的故事。一直没有找到机会动笔，原因是还没有把我们这一代人悟透，没想明白。前两年，我写了一部《春风十里》，是关于一个战士因为一段不经意的感情故事而改变命运的小说。这让我似乎找到了讲述自己经历的发切点，然后就有了这部《五湖四海》的长篇小说。

主人公刘天右来自农村，吹得一手好唢呐，然后被部队文工团特招人入伍，他的人生就此得以改变。他先是爱上了军长的义女，种种原因没有修成正果。随后，他被安排到边防哨所当排长。从军机关大院到最边远的边防哨所，这种落差无疑是巨大的。刘天右此前的顺风顺水被兜头浇了盆冷水。坚持中，他终于等来了军区文工团招人的机会，得以重回文工团。他又变成了舞台中心聚光灯下的一个演员。命运的转折并没有到此打住，很快他又面临部队裁员，转业到了地方。地方的工作并没有想象中美好，在“下海”大潮的裹挟下，他辞职“下海”，并挣到了第一桶金。世事难料，正当他准备大干一场时，天有不测风云，他囤积

的饲料因东南亚闹鸡瘟而搁浅在码头上。困难之际，是部队当年的战友向他伸出了援手。他开始萌生了把昔日战友重新聚拢在一起的想法，于是“迷彩乐队”诞生了……

《五湖四海》是一部刘天右的个人成长史，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我们时代大背景下许多人共同的经历。我们任何人的成长都离不开时代。我们融入时代的同时，时代也在雕琢着我们。

在这部作品中，我着重刻画了亲情、爱情、战友情。每个人的人生经历都离不开复杂的情感。如果说亲情、爱情是天意，战友情就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刘天右后来几次在命运转折的关口，都会有战友站出来相助。如果没有这些战友，刘天右的命运也许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正是这种战友情改变了他，他也在改变着战友。

在《五湖四海》这部小说中，通过刘天右成长的命运，我把他与时代背景串联在一起。那些背景，是作品中人物命运的时代投影，也是我们这代人所共同经历的。谨以此篇小说，献给我们经历的时代和我的战友们。

一位特殊参观者

■杨艺琼

多小时，凭着过硬本领，排除舰艇故障，保证轮机正常运转，直到取得战斗胜利。他因此被誉为“钢铁战士”，所在艇被海军授予“海上英雄艇”荣誉称号。

当走到“八六海战”展板时，麦老停了下来，眼睛里泛着光芒，为我们讲述起当时的战斗场景：“战士们都是靠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勇敢地打击敌人……”麦老好似又回到了那段战斗岁月，身边似乎又出现了和他一起并肩战斗的战友。

听着他的讲述，我被英雄前辈们英勇无畏的精神深深打动。继续参观，麦老被一块展板上的石碑画面吸引，驻足良久。他凝视着石碑上的8个大字，“大好河山，寸土不让”。看着麦老专心致志的样子，我也不由得感慨万分：时光的予午线划过数十载春秋，更替的是年龄，永保的是初心；地域的经纬圈横跨祖国的大江南北，变换的是面孔，不变的是忠诚。

在一组实物展柜前，我激动地介绍道：“这是您捐赠给军博的弹片，我们将它珍藏在这里，向观众们讲述您和前辈们的英雄故事。”看着两块已经锈迹斑斑的弹片，麦老用坚定的语气说：“我的愿望就是保卫祖国，保卫红色江山永不变。”

两个小时的参观，麦老坚持不坐轮椅，也不要人搀扶，自己走完整个展厅。能为老英雄做讲解，对我来说也是一段难忘的宝贵经历。

迷彩芳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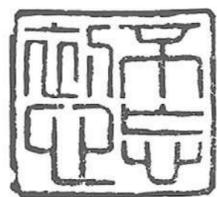
今年7月3日，我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担任讲解员时，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参观者。

他就是前来参观“在党的旗帜下前进——人民军队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展览”的“八一勋章”获得者麦贤得。

当时，正在备讲室待命的我们，接到通知：“门口排队，迎接来客。”随后，只见一位古稀老人在众人的簇拥下向我们走来。

也许是机缘巧合，我解说的部分正是麦贤得老英雄亲身经历的那段峥嵘岁月。随着人声渐近，我的心跳也逐渐加快，总担心自己讲解不好。其实在这之前，我早已做好了准备：把常服烫熨得棱角分明，卷帽檐整理得端端正正，又在镜子前反复调整自己的仪态，并不熟悉解说词。按照队长的话来说：“迎接英雄就要有迎接英雄的样子。”

在麦老参观前，我了解到这位老英雄的生平：1964年3月参军，次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某型号护卫舰机电兵，在1965年参加了“八六海战”。战斗中，他在头部遭受重创，鲜血糊住双眼的情况下，依然坚守岗位3个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张级三作



■阅图

攀登

■摄影 常曦蒙

这幅作品拍摄的是新疆军区某部官兵在高原山地进行攀登训练时的场景。险峻的山崖上，官兵们目光坚定、携手向上攀登，展现出挑战极限、敢打必胜的精神风貌。拍摄者利用高速快门，采取俯拍手法，并选取合适拍摄位置，使3名官兵的形象远近大小不同，呈三角形构图，让画面的空间结构在稳定中又呈现出变化，增强了照片的感染力。（点评：贾国梁）

文史撷珍

1941年12月25日，港英当局向侵华日军投降，繁华的“东方之珠”陷入无尽黑暗。由于当天恰是西方圣诞节，因此史称当日为香港的“黑色圣诞节”。香港沦陷后，被困在港的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进步人士陷入危险境地。危难之时，中国共产党挺身而出，周密筹划，千方百计组织了秘密大营救。

抗战爆发后，邹韬奋、茅盾等许多爱国文化人士先后辗转来到香港进行抗日救亡活动。香港一时间成为群英荟萃、人才济济的抗日文化中心。日军占领香港后，大肆搜捕这些爱国文化人士，还在报纸上刊登启事，“寻找”茅盾、邹韬奋等人。他们甚至还在戏院、影院中打出幻灯告示，直接点名夏衍、蔡楚生等人前往半岛酒店“会面”。

在多方呼吁下，国民政府在香港彻底沦陷前才仓促派出飞机，信誓旦旦要将文化精英接回国。然而，当众多记者蜂拥前往重庆机场准备迎接归来的文化人士时，却发现飞机带回的多是国民党的“皇亲国戚”以及他们的保姆、侍从，甚至还有多家家犬。一时间群情鼎沸，“人不如狗”等讽刺文章竞相刊载于报刊。国民党对此除反复“辟谣”外，再无实质有效的营救行动。

绝望之时，中国共产党毅然肩负起了营救民族文化精英的重任。1941年12月，周恩来两次急电在香港的廖

香港秘密大营救

■周云

承志等人，“应在港朋友先接至澳门转广州湾，或先赴广州湾然后集中桂林。”这里的“朋友”指的就是滞留在港的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进步人士。周恩来对撤退工作做了具体布置，并特别指出，许多重要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都是民族精英，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不怕困难、不惜牺牲，想尽一切办法把他们营救出来。

接到指令后，中共南方工委、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东江纵队等党的组织和所领导的武装力量迅速部署，制定了缜密的营救计划，规划了经九龙和经澳门两条营救线路。廖承志等中国共产党人依据营救方案立即联络了柳亚子、廖沫沙等文化人士，组织他们疏散隐蔽。

大批人员的转移从1942年1月5日开始。当天，夏衍、金仲华等16人即通过澳门路线进行撤离，此后每天都有一批文化人士离开香港。1月9日，茅盾、戈宝权、胡绳等几十位文化人士扮成“难民”，由交通员李锦荣带领，避开日军岗哨和检查站，集合到铜锣湾避风塘的海上交通站。第二天一早，这些文化人士又分乘小艇，

趁巡逻日军换岗之机，疾驶渡海，终于安全抵达九龙营地。随后，茅盾等人在游击队员的护送下，躲过日寇特务的搜捕，穿越土匪横行的荒郊野岭，抵达位于广东白石龙的东江纵队驻地。接下来的几天里，胡风、丁聪等众多文化人士也陆续抵达。最终，这场秘密大营救共营救滞留在港的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进步人士及家属800余人。

文化人士抵达东江纵队驻地后，大都在此逗留了一段时间，有的一直待到农历新年。他们白天或参加游击队的宣传工作，或进行抗日文学创作，或体验游击队员的生活。夜晚，他们常和游击队员们一起举行联欢会，互相激励、苦为乐。

1942年2月14日是农历除夕。由于日军在此之前撤出了惠州，地方党组织立即在惠州设立了交通站和接待站，打通了到韶关、桂林的交通线。组织决定除夕当天先将茅盾、张友渔等人护送转移至惠州，邹韬奋等其他文化人士暂留游击区共度新春。

除夕当天，茅盾等一行20多人就在

地方党组织的接应下出发了。众人冒雨艰难前行，直到凌晨才抵达惠州。胡绳曾有感而发以《东江》为题作诗一首，表达当时颠沛奔波的心境。“又是仓皇万里行，岭南春半半阴晴。东江船女歌如哭，月黑波深待曙星。”历经沧桑的中国，“曙星”何在？是当时爱国文化人士心中最深沉的思索。茅盾也著书《脱险杂记》，并称此次营救行动是“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邹韬奋等人后来回忆起在游击区过除夕的情形，依然十分激动。“纵队政委林平代表全体指战员向大家祝贺新春，郑重热烈地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进行慰问。”“大家起立鼓掌，一面接受慰问物品，一面拭着激动的眼泪，看着，笑着，想着延安党中央，久久不能平静。”

对于这段惊心动魄的往事，夏衍曾评价道：“大营救表明了党中央、南方局对知识分子的关怀。大营救以生动的事实，说明了共产党人和游击区军民在万分困难的环境中，舍生忘死地执行统战政策的史事。这是真正的肝胆相照、生死与共。”